

由东西方宗教观差异 分析道教衰退之根源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3-0056-05

●李海梅 陈昌文

[摘要] 东西方宗教发展迥然不同的态势,根植于东西方截然相反的宗教观。道教信仰的多神论、道教生存中的宗法依附性以及道教的信仰诉求机制等构成了道教信众的基本宗教观,在特定历史时期推动了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但同时也蕴含了道教衰退的基因。

[关键词] 东西方 宗教观 道教

[中图分类号] B95

[文献标识码] A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把道教描述为“作醮打科、请神弄鬼、驱魔驱邪的民间医生”。这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给出的一个切中肯綮也无可厚非的描述。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大而化之、根深蒂固的传统认识,又剥夺或者是抛弃了道教源远流长的生命光辉和广博精深的文化内核。于是,当我们站在历史的末梢重新审视道教的生命时,今昔对比堪忧。“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道教胜况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道风日渐式微,道途难辨莫测。道教衰败、道教迷信沉渣泛起、道教发展穷途末路等措辞的出现直接凸显了道教生存危机。

一、东西方宗教发展背景下的道教衰退

基于人类生存和信仰的需要,宗教已经伴随人类跨过百万年历程。无论是古老的原始自然宗教,还是人类文明史发展阶段的制度化宗教,宗教作为特定社会的重要社会构成都对同时期的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根源性影响。尽管人类初期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不同,产生的宗教类别存在许多差异,但在人类的各个发展阶段,不同地区、不同人种的人类族群的宗教总体上是沿着一致的路径向前发展。而当把时间定格在 19 世纪中后期到 21 世纪这一特定的人类发展阶段时,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东西方的人类在宗教选



择面前出现了分歧^①：西方人如痴如醉、一如既往地坚持他们神圣的宗教信仰，东方人却亲手撕毁曾经编织数千年的宗教之衫，亲手推倒代表封建迷信的宗教之墙，西方的宗教之光仍照耀人类的心灵，东方宗教却失去昔日光芒，前进发展如履薄冰。“英国《国际基督教传教公报》1998年第1期发表的统计数字，从1990年到1997年，全世界人口总数从53亿增加到59亿，信教人数从42亿增加到47.8亿，已占总人口比例的81%，其中基督教徒从17.6亿增加到19.9亿，穆斯林从9.35亿增加到11.54亿，佛教徒从3.23亿增加到3.28亿。”^②另外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1998年各种宗教信徒仅一亿多人”。^③上述数字统计是否准确可另当别论，但从中不难发现东西方宗教发展情况不平衡。总的来说，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西方宗教仍继续平稳发展，而东方宗教相对落后，全世界不信仰宗教的人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东西方宗教发展的差距还可从中国国内宗教信仰情况窥见一斑。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在中国已有2000年历史，现在中国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活佛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道教发源于中国，已有1700多年历史。中国现有道教宫观1500余座，乾道、坤道2.5万余人。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为中国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的群众所信仰，这些少数民族总人口约1800万。现有清真寺3万余座，伊玛目、阿訇4万余人。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4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基督教（新教）于公元19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基督徒约1000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④这些数据显示，西方宗教不仅在西方平稳发展，而且在东方也势如破竹，发展迅猛，作为东方传统宗教的代表佛教和道教明显式微，尤其是道教，衰颓之势非常明显。

虽然综观当代代表道教的胜地宫宇，还保留有北京的白云观、四川的青城山和青羊宫、广东的罗浮山、福建的武夷山、浙江的天台山、江西的龙虎山、甘肃的崆峒山、陕西的华山、山东的崂山、湖北的武当山等处^⑤，虽然道教也仿效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建章立制，印刷道经书册，主持斋仪，规定戒律，得以保存部分道教躯壳，^⑥但业已奄奄一息，自顾不暇。道士中，人才衰落，已无余力承前启后，开展弘宗传教的事业。正统的神仙学术无以昌明，民间流传的道教思想往往与巫蛊邪术不分，以至于民众将道教观念与画符念咒、妖言惑众等交相混杂，积重难返。

中国古贤的道教想象赋予人生际遇和与人类生存攸关的各种对象以神圣的意义和神奇的遐想，把人生经验和社会生活变成了色彩斑斓的种种文化形式，成了规范世人之行为的准则与习尚，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遗存在现代人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份子。而面对当日将西垂的道教生存事实，忙碌于世俗生活中的社会大众可以浑然不觉地沉浮于西方文化的大海之中，而有志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思索和建构的学者却不能不对这种现象作一理智的分析和追根溯源的研究。拥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道教，何以在现代社会难以立足？如果要真正了解道教衰退的原因，就必须对东西方的宗教作出准确的定位，找到东西方宗教差异的原点，兹以为这个原点就是东西方迥然不同的宗教观。东西方不同的宗教观催生了东西方不同的宗教存在逻辑，也预设了东西方宗教不同的宿命。

① 这里所说的东西方，并不是实际地理意义上的东西方，而是从宗教意义上说的。东方宗教指的是佛教、道教等，西方宗教指的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

② 龚学增：《世界宗教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国宗教》，1998（4）。

③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R]，北京：国家宗教事务局，1997。

④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R]，北京：国家宗教事务局，1997。

⑤ 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⑥ 张洁：《论道教形态及衰落原因》[J]，《大理学院学报》，2007（1）。

二、东西方宗教观的差异

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人类是怎样产生的?人与神的关系怎样?这是世界上所有宗教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问题,由此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和视角,形成了与各个社会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宗教观。

1. 西方的“一神”与东方的“多神”

西方宗教产生于中东地区的希伯来人 and 阿拉伯人这两个古老民族中。游牧的生活样态使他们练就了勇敢、奔放和善于抗争的民族性格,恶劣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使他们产生了对力量的向往,进而产生了一神观念,他们尊崇单一的神,这个神就是创世神与造物主。在早期宗教犹太教中,希伯来人很早就确立了亚卫神的独统地位,他们在宗教经典《旧约·创世记》中详细描述了神在七日内创造世界的经过,并明确指出神在第六日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人类。犹太教对西方宗教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基督教汲取了犹太教的宗教要义,并且把《旧约》全部选入宗教经典《圣经》中,创世传说也采取拿来主义全盘照收,只不过把亚卫神改作上帝耶和華,并且尊奉耶稣为救世主,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同样对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伊斯兰教,也是建立在尊崇一神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真主安拉是世界的创造者,并且强调安拉的无实体,禁止偶像膜拜,安拉派遣有许多先知拯救人类,穆罕默德就是其中的最后一位。总之,西方宗教只有单一的神,神的地位非常崇高,神对人类生活的介入也十分明显,但并不直接显形,而是通过向人类社会派遣先知来执行神的意愿。西方宗教认为神就存在于人类身边,他们可以随时向神忏悔,只有虔诚的祈祷才能让人获得拯救,人死后还会进入天堂或地狱。

东方宗教,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多神乃至泛神,如佛教有佛陀、菩萨、天神等各类神灵,道教有各色各类神仙,并且在道教与佛教的共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互不干扰、相互印证并和谐共处的多神世界,甚至连儒家文化都受到多神论的影响,在社会上推崇的孝道,其实就是把祖先泛神化。泛神的直接后果是凡人可以成圣修仙,间接后果则是不承认独一至大的神。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地区,一神教就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通过文献与对历史时期的研究来看,中国一直是原始萨满教或万物有神论占统治地位,它们与后来的佛教以及道教一起,不与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一神教属于同一范畴,这为双方之间潜在的对立提供了基础条件。

2. 东西方的人与神

东西方的人与神的关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宗教强调人与神是对立的,认为上帝是万能的,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并接受上帝的控制和管理。人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图去做事,尊崇上帝的旨意,死后才能进入天堂,否则将会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这个意义上讲,永远只能按照上帝旨意生活的人,不过是上帝的奴仆而已。

与之不同的是,东方宗教并没有把创世神话融入于宗教之中,无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由印度传至中国并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它们把世界的本源看作是“阴阳二气”和“缘起”,都没有一个具体形态的世界主宰者,世界完全是自生自灭的,包括人类自己也是由混沌之气形成,佛教甚至认为人本身也是不存在的,即“无我”。佛教的释迦牟尼、道教的元始天尊均是凡人修炼得道而成。因此东方宗教认为不存在单一的神力,认为通过某种途径,人可以超凡脱俗,成佛成仙。佛教徒通过念经颂佛,体悟佛教真谛,成为得道高僧,可以圆寂成佛。佛教甚至认为普通人通过皈依佛门也可增长佛性,就连杀人凶手都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教中,神仙原本并非神仙,而是人经过修炼而成。道教与佛教不同的是它提出了各色各类修炼技术、神仙法术,人既可以得道成仙,也可以通过炼丹成仙,尤其是后者为“成仙”提供了一条捷径。不仅人可以成神,而且万物皆有灵,山可以成为山神,土地可以成为土地神,河可以成为河神,就连花草树木、各类动物也可通过修炼成妖成精。因此在东方的宗教里,人和神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人类社会与神佛完全是平行的,互不干涉,甚至道教的“三清”,佛教的佛祖、菩萨等神也是可以并存而互不相干的。在东方,没有造物主和尊崇造物主的观念。西方宗教的人是接受上帝的旨意,做上帝的忠实子民,而东方宗教的人是学习模仿神佛,最后的归宿是修成正果成为神佛。西方的人与神是不平等的,而东方的人与神则是平等的,甚至可以“交流”(换位)的。

3. 西方的宗教立国与东方的宗法治国

西方宗教与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很多国家的宗教首领也是国家首领,国家的法治建立在传统的宗教教义的基础之上,一国的主要宗教称为“国教”,全民信教,宗教与生活紧密相联,宗教事务与活动成为生活的一



部分。就连国内宗教流派众多的美国,其国家精神也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教义逻辑之上的。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国家是依靠宗教立国,宗教在国家制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国家的夏商周三代,把以“敬天法祖”为基本内容的宗法性宗教作为国家宗教,对社会文化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来规范社会习尚。但由于东周的“礼崩乐坏”,产生了举世瞩目的诸子百家世俗文化。汉朝在中央集权制帝国建立后,一方面重建国家宗法性宗教,另一方面推行“独尊儒术”方针,把本为世俗性人文学说的儒家抬高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①从此,儒家成为中国历史上支配一切文化的主宰。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道教、佛教都曾先后或深或浅地渗透并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整个说来,它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不曾取得支配地位,作为“国家宗教”的宗法性宗教虽然仍得到作为“国家哲学”的儒家的支持,但其地位与西方宗教的治国地位不可相提并论。

4. 东西方宗教信仰诉求的“赎罪”与“祈福”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宗教信仰者都会进教堂或寺庙进行祈祷,但东西方宗教信仰者的信仰诉求存在根本的差别。犹太教认为人类生下来就是有原罪的,人的一生就是不断为自己赎罪,因此人必须忏悔,还得守“摩西十诫”。而处于东方宗教观指引下的民众认为,神佛皆灵,只要虔诚,有求必应。信奉道教的人认为,供奉道教神灵或神像是能够得到回报的,毫无疑问,这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是完全一致的。^②在这种实用主义诉求的驱动下,中国人对神佛的态度表现出功利性的一面,中国人逢庙烧香,遇像磕头,各路神仙谁都不得罪,连灶王爷也不忘记用糖饴封嘴,只为能得到保佑。因此,西方教徒去教堂是赎罪,而东方善男信女进寺庙则是祈福,一个是期望卸下,一个是期望拿起。西方教徒去教堂是对自己所犯的过失作检讨,期待上帝原谅自己,指引生活的新方向;中国人去寺庙拜佛,则是期望神佛保佑自己健康长寿、升官发财,获得更多的实惠。

三、道教宗教观与道教生存样态

有什么样的宗教观,就有什么样的宗教生存样态。道教的核心宗教观酝酿着道教的创教实践,规定了道教的发展形式,奠定了道教信仰的内在形成机制。

1. 多神的宗教观与道教的神仙成长实践

道教主张万物有灵,倡导神仙学说,从研究宇宙人生问题着手,认为一个人可以用各种修炼方法,修到长生不老而变成神仙,进入与天地日月同寿的境界。道教的这一核心思想蕴含着道教形成发展中的几个不确定因素。首先,道教成仙的对象是不确定的。世间万物只要时运成熟,皆可通过一定方法的修炼而成神成仙。其次,成仙的方式不确定,可以是像佛教那样的闭关修炼,也可以是隐居山林,还可以是入世修炼,云游四海,行走江湖,甚至可以通过炼丹吞药而成仙。第三个不确定的因素是神仙的地位。与西方宗教创世神的万能不同,道教的各路神仙法力和职能各不相同,道教中各路神仙各具其能、各司其职,共同构成和管理着神仙世界。这些不确定因素都预示着,道教中的神仙人物的形成具有分散性、偶然性,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产物。纵观道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确实有一个遍地开花的图景。汉末张道陵感叹读书无益于年命之事,遂学长生之道,居鹤鸣山中创五斗米道。魏伯阳援引《周易》、老庄学说、神仙丹道说三种学说,著作《周易参同契》,成为道教“火龙真人”。东晋许旌阳提倡传统文化的孝道,创立净明忠孝教,虽与张道陵时代不同,而且两教南辕北辙,互不相关,但其传播的南方道家思想,深入世俗人心,成就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庐山道法。而同期抱朴子葛洪则修炼丹道于广东,著作等身,遗留后世丹经著述和修炼丹道的规范,成为晋代列仙中的奇才。此后北魏寇谦之创立正式道教天师道,捧出教主“太上老君”。晚唐以后,有吕纯阳真人,直接上承魏伯阳的丹法为道统,崛起于道教之间,功勋卓著,可比太上老君的副亚。南宋王重阳提倡敦品励行、修心养性的渐修教化,创立全真教。总之,道教的创立发

① 吕大吉,牟钟鉴.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6~7.

② 游彪.传说与事实之间:道教与宋代社会的融合[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李海梅 陈昌文·由东西方宗教观差异分析道教衰退之根源

展过程,也是中国各个时期历史人物出道成仙的过程。道教推崇的万物有灵、神仙学说酝酿了道教千年的成长模式,同时诸神统治的世界及修炼成仙的随机性和捷径也暗含了神仙道统传承的内在信仰危机。

2. 宗法治国与道教的非制度化

尽管道教在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同时期当权者的支持,多数朝代都流传着君王与道教发生关系的传神故事,但由于道教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具有统一的教条、教义,而是种类繁多且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同时也没有及时地像儒家学说那样集大成于一统,成为组织人间社会的规范,因此尽管是中国本土化的宗教,却依然没有能够与政治合而为一,成为中国的国教,国家的正统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中国历朝历代的治国策略都是以宗法治国。由于道教创教、传道的随机性、神秘附会性,再伴之以延年益寿、修身养性等民间普遍的心理诉求,道教极易在民间生根发芽,如许旌阳创立的江西庐山道法、流传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道教播洒于民间的种子也极易为人所利用,如汉末张角的黄巾起义、宋元之间的白莲教、清末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等,借用宗教之名,模仿道教创教形式,阴谋政治运动。因此,道教自身的分散性、非规范性,加之其创教、授徒的神秘路径,使得道教始终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教义和规范。相比起为当权者重视并推崇的制度化模式,道教在中国民间的非制度化流传却更为久远,应用的领域和范围也更为宽泛。道教的这一非制度化模式,一方面促成了道教广泛传播,深入民间的生活习俗,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过于宽泛和光怪陆离,而掩盖和埋没了其精湛的核心文化精髓。

3. 功利诉求与道教信仰机制的破灭

西方宗教信仰机制是教徒通过忏悔来反省自己的罪过,从而达到心中释然,因此西方宗教信仰机制总体上讲是比较理性的。而东方信仰机制是信仰者通过虔诚祈祷,向神灵索求个人愿望的满足,希望能够借助神灵保佑从而实现这种愿望。因此这是一种现实导向型的信仰机制,如果信仰者愿望实现,则是神灵保佑和信仰者祈福的结果,如果愿望没有实现,则有可能是信仰者心不诚或时机未到,因此也能得到心理上的安慰。这种信仰机制也逐渐保留和稳定下来。但对于个人而言,如果索求过多或多次愿望未能实现,或面临重大灾难而未得到神灵保佑,这时信仰就面临着破灭。因此东方的信仰诉求决定了信仰的脆弱性。在信仰面临破灭之际,自己亲手盖的庙宇可以被推倒,自己亲手塑的神像也可以被踩踏,人们会疯狂地报复欺骗了自己的神灵,一次又一次指挥自己的左手与右手为敌。作为东方宗教的道教比起佛教来目的更为直接,它就是应现世的需求而生。当现世的需求失去或外来的新生力量打破道教的信仰机制时,道教的“祈祷—索求”的功利性信仰机制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崩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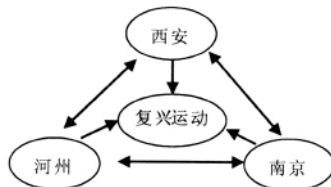
四、结论

宗教观对于宗教的形成、发展乃至衰退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也是广泛的。宗教观作为宗教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植于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土壤,同时又渗透到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东西方社会的宗教就是在东西方的宗教观与现实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中变迁、发展的。孕育于东方的多神论为道教神仙的神秘附会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温床,推崇宗法制度沿袭的政教观使得道教在上层社会呈现依附性,在下层民间社会呈现更多的非制度化形式,而实用主义的信仰诉求机制促成了道教民间信仰的广泛传播,同时也预设了道教信仰机制在当代崩塌的命运。这一切都充分说明,道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符合大众生活需要的宗教观,同样,道教的衰退之根源,也可以追溯到它诞生之初的宗教观。(本文英文摘要见 P.67)

[收稿日期] 2009-12-16

[作者简介] 李海梅(1978~),女,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学博士。成都 610064

陈昌文(1955~),男,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成都 610064



经堂教育、汉文译著和门宦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们构成了明清之际伊斯兰教中国化或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三个方向,开拓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对话和互动的空间,表明了两种文明的互动向更深层次发展,为中国穆斯林指明了生存方向,对于回族等民族的稳固以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有着巨大的贡献。

因为有了经堂教育这个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教众之间的中介,宗教职业者得以源源不断地产生,即使是语言不通,因为有了汉文译著,中国汉族等其他民族得以了解伊斯兰教,理解儒学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互通之处,中国穆斯林得以了解中国深层的文化及其人生哲学。因为有了门宦运动,穆斯林社会以教派为中介,得以与中国传统社会有了更深的结合,尤其是教派门宦的组织化使穆斯林民间更顺应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组织管理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能在中国生存下来,穆斯林民族(回、东乡、保安、撒拉)能在中国形成并巩固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这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适时出现。

[收稿日期]2010-04-08

[作者简介]杨志娟(1971~),女,回族,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烟台 264005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Chinese Islamic Renaissance Movement: the Importance of Xi'an, Nanjing and Hezhou to Chinese Islamic Renaissance Movement in Ming and Qing Periods

Yang Zhijuan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crisis of faith, Hui people started the Islamic renaissance movement centered on Xi'an, Nanjing and Hezhou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Although the movements in these three regions have different contents and forms, the initiation of Mosque educati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slamic class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Islamic sects were all aiming to save the whole ethnic group and revive Islam.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reason why these movements rose up in Xi'an, Nanjing and Hezhou from the human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Xi'an; Nanjing; Hezhou; Islam

(上接第 60 页)

Analysis on the Source of the Decline of Taoism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iental and Western Religious Perspectives

Li Haimei Chen Changwen

Abstract: The difference i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religions are originated from their opposite religious perspectives. The basic Taoist philosophy, consisting of polytheism, patriarchal dependency in its survival and the utilitarianism of religion,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and its declines as well.

Keyword : Oriental & Western; religious perspectives; Taoism